

日本“非汉学家”花崎采琰的中国词译介

杨嘉琛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日本“非汉学家”群体中的花崎采琰及中国词日语译介成果，分析她在中国词译介以及中国词在日本传播和影响方面的贡献。通过对花崎采琰个人背景、译介活动及其译著的研究，揭示了她如何推动中国词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花崎采琰的译介工作不仅丰富了中国词在日本的译介形式，还为日本读者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

关键词：中国词译介；非汉学家；花崎采琰

一、日本“非汉学家”中国词译介的研究现状

20世纪后，日本的填词创作骤然减少，词学研究和中国词的日语译注成为日本词学活动的主要内容^[1]。以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等日本“汉学家”为先锋，在进行中国词学研究的同时，也逐渐尝试对中国词的译介，开启了日本词学研究及译介并存的新格局。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民间还出现了一个有别于“汉学家”的译介群体——以花崎采琰、小林健志、日夏耿之介等为代表的“非汉学家”群体，也开始尝试中国词的译介。

“非汉学家”群体在主业之外，利用闲暇时间尝试使用现代日语对中国词进行译介，他们的译介活动“有别于传统的日语训读之法，是面向日本普通读者的译介，大大扩展了词在日本的受众”^[2]。这一群体还成立学社、创办杂志，交流翻译心得，活动规模和译介成果也逐渐增多，反映了当时的汉文热潮和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汉文素养。

尽管有关中国词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近年来得到了较多关注，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汉学家及其词学研究成果上，仅有一小部分研究关注到了日本民间“非汉学家”群体对中国词的译介。如汪超^[3]的关注到了译介中国词译者的身份，他指出在中田勇次郎、青山宏、村上哲见、仓武五四郎等日本汉学家以外，“日本民间还存在有如日夏耿之介、花崎采琰、河上肇、小林健志、

本阵良平等业余译者对花间词的译介”，并且“业余译者这一特殊群体，也值得研究日本近现代词学史时特别关注”。刘宏辉^[2]在总结近代中日词学交流的新变及其意义时，也特别提到“中日词学译介在近代进入全面繁荣的阶段，词集的现代日语译注开始出现……如花崎采琰、小林健志、日夏耿之介的词译介也值得关注”。这些研究虽然涉及了日本民间“非汉学家”对中国词的译介，但均未展开论述。

日本民间“非汉学家”群体的中国词译介活动及成果极为丰富，特别是花崎采琰的译介成果尤为突出，不仅在数量上领先于其他译者，而且在译介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也表现出色。但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群体的关注度不高，特别是尚未出现有关花崎采琰及其译作成果的专题研究。

二、花崎采琰及其中国词译介活动

有关花崎采琰生平及其对中国词译介活动的研究相对有限，仅有部分文献提到她是一名“家庭主妇”^[4]，此外无其他详细记录。为更准确地了解她的人生经历及译介活动，本文通过考证其未公开出版的私家版自传《自叙伝 日本花崎貞》、《墜露のような人生》，以及其长子花崎皋平编纂的《墜露：花崎采琰記念集》，呈现一个花崎采琰更为完整的生平图像。

花崎采琰(Hanazaki Saien)，原名梶田贞(Kajita Sada)，花崎为其夫姓，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东京府东京市小石川区(今东京都文京区)，次年弟弟梶田义一出生。在其两岁时，父母因肺结核相继去世，她和弟弟由外祖父母抚养。其外祖母自日本女子大学建校以来就一直担任教师，这在女性婚后大多成为全职主妇的时代并不多见。

从日本女子大学附属女子高中毕业后，她在家自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由西安翻译学院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4B61)

作者简介：杨嘉琛(1993—)，男，汉族，陕西省西安人，硕士研究生，西安翻译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日本词学、域外汉籍。

了两年，并于1922年4月以旁听生身份入学东洋大学国语汉文系。1923年3月，花崎正式考入东洋大学东洋文学专业，主修汉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大学毕业后，她在私立武藏高中图书部工作，并通过了当时难度极大的“文部省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教员检定考试”，成为私立京北中学的汉文科教师，在那个时期，女性在男子中学担任教师的情况极为罕见。

之后，她在歌人前田夕暮的短歌会上认识了花崎利义，并于1930年8月结婚，婚后辞去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尽管她全身心投入家务和抚养三名子女（长子花崎皋平、次子花崎覃、长女花崎珠），但她对文学的兴趣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愈加浓厚。在此期间，她受到了今关天彭、日夏耿之介以及词学家中田勇次郎的指导。

1932年，花崎采琰创立了“紫式部学会”，并创刊学会会刊《むらさき》。1951年1月，她又创办杂志《东方文芸》，并在五年内出版了至第15期。此外，花崎还持续向《妇女の友》、《古酒》、《诗歌》、《新经济》等杂志投稿，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中国词的译介。

1957年，首部中国词译作《淚眼集》出版，自此她以“花崎采琰”为笔名共刊行了11部著作。除《安房的四季》是一部和歌集外，其余十部均为中国词的译本。其中，《全訳花間集》、《中国の女詩人》和《康熙帝御製「広群芳譜」による花の文化詞》三部译著获得了日本翻译家协会的翻译文化奖。

1998年5月24日，95岁高龄的花崎采琰于北海道小樽市的长子家中去世。长子花崎皋平于2003年以私家版形式编纂并刊行了《墜露：花崎采琰記念集》，收录了诸多花崎采琰的生前遗文。

三、花崎采琰的中国词译介成果

花崎采琰一生共出版了11部著作，其中10部专注于中国词的译注，其数量远超其他“非汉学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汉学家”群体。此外，她的译介质量和影响力亦不逊色于其他译者。尽管部分译著仅为“私家版”，印刷数量较少，除了花崎采琰母校东洋大学图书馆外，在日本仅有少数公共图书馆收藏。但这些译著仍然是研究中国词在日本的译介及日本词学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藏馆等方式，对这些译著原本进行了阅读和收集。其中，《新訳漱玉詞》、《全訳花間集》和《中国悲曲 飲水詞》分别为李清照《漱玉词》、赵崇祚编《花间集》以及纳兰性德《饮水词》的译本；其余7部译著则是花崎采琰根据不同主题编译的选译本。以下

列出各部译著的详细信息。

(1)《淚眼集》(四季社，1954)：中国词选译本，卷首有今关天彭题“采琰夫人淚痕集題辭”，目录后刊载了花崎采琰自作词两首——《浣溪沙》和《武陵春》。正文开始前有题为“詞話”的绪论，对词这种中国古典文学形式进行了阐述。全书收录了从五代到宋代16家词人的41首词。这部译著是继1940年中田勇次郎《宋代の詞》之后，于日本出版的第二部中国词选译本。两部译著的结构大体相同，均按词人排列，内容包括词人小传、日语译文及解说，而中文原词则统一收录在卷末的“原词索引”中。此外，“后记”中还特别提到该部译作经由日夏耿之介审阅。

(2)《新訳漱玉詞》(新树社，1958)：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集《漱玉词》的译本。卷首有今关天彭题写的绝句两首《采琰夫人新译易安居士漱玉词题词》，以及孙伯醇所作的中文序和中田勇次郎撰写的日文序，序中中田称花崎为“日本唯一的闺秀词人”。正文开始前的绪论，包括“关于宋词”及“关于李清照”两个章节。“后记”中记载了因日夏耿之介的推荐而促成此部译著的经过。1957年秋，花崎采琰在小林健志的藏书中发现了李文禧编《漱玉词二卷》，从而开始了这部词集的翻译。在缺乏参考书籍和注释的条件下，依靠上述四位的协助完成了该书的译文。译文之后附有“辯誣”一文，对李清照在与丈夫赵明诚去世后是否再婚等个人细节进行考证，书末还附有“易安居士年谱”。

(3)《花譜》(大雅洞，1961)：分为《春花词》和《秋花词》两册，均为和装本。两册分别以春花和秋花为主题，各选录了12首词。内容按照花的板画、日语译文及原词的顺序排列。该选译本限量刊行175部，笔者所览的藏本上册第一页上有“花崎貞印”和“癸卯春日 たちばな会 牡丹上演記念 吾妻君子様惠存”字样。”

(4)《全訳花間集》(櫻楓社，1971)：目前唯一的《花间集》日语全译本。封面由中田勇次郎题词，扉页附有《花间集》(南宋绍兴十八年刻晁谦之覆刻本)的影印照片，以及今关天彭题词自作词《浪淘沙》一阙。正文之前，中田勇次郎与作者本人分别作序对《花间集》进行解说。

(5)《愛情の宋詞》(私家版，1981)：以“爱情”为主题的中国词选译本，收录17位词人的90首词。序言中作者记述了与片山哲的交流经历。片山哲曾阅读过《全訳花間集》和《愛情の宋詞》的手稿，并希望花崎采琰能够继续翻译中国词，以完成《愛情の宋詞》的翻

译,这一希望成为本译著出版的契机。该书按照词人的顺序排列词作,后附有词人小传、原词、译词,并对每首词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评析。

(6)《晚唐五代流行歌謡》(私家版,1982):涵盖从唐代韦应物到五代花间派及南唐词人,共翻译了32位词人的103首词。

(7)《中国の女詩人》(西田书店,1985):选取了中国历代的闺秀诗,按时代顺序和主题分类编排,是一本系统的选译本。书中涵盖了从中国最古老的诗篇《诗经》到清代末期的各类诗歌,包括《诗经》、乐府、古体诗、近体诗、词、曲、民歌等文体,共174首。正文前有中田勇次郎的序和作者的自序。正文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并根据主题和流派分为三十四章,包含各时代的诗歌及诗人的介绍、日语译文、原文和解说。该书受到了武部利男《白楽天詩集》的影响,全书采用假名进行翻译。作者从东洋大学在读期间开始翻译本书,尽管中途因各种原因曾一度中断,但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最终完成,并因此获得了日本翻译家协会的特别翻译功劳奖。

(8)《中国悲曲 飲水詞 納蘭性德》(西田书店,1985):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词集《饮水词》的译本。序文对《饮水词》的特点和作者背景进行了详细解释。该书共翻译了81首词作,与《中国の女詩人》一样,均受到武部利男的影响,全部采用假名进行翻译。此外,书中的每一首词都以词牌名作为标题。书末的“后记”回顾了与有吉佐和子的交往,并说明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纪念有吉佐和子的忌日。

(9)《中国詩詞選 平和詞・山水詞・愛恋詞》(私家版,1987):分为“平和词”、“山水词”和“爱情词”三个主题,共翻译了59首词。序文中解释了主题的选择,认为词在天地自然的平和氛围中,如花般、如鸟般成长。即使在词中表现出的苦难和泪水,也被这自然的平和所包容,奏出了优雅的爱情旋律。中国文人钟爱山水诗,在美丽的山水中,花开鸟鸣的风景使人的心灵得到美丽和平和的滋养。

(10)《康熙帝御製「広群芳譜」による花の文化詞》(私家版,1989):以描写花卉为主题的选译本。卷首插图包括其夫花崎利义创作的油画《牡丹》、作者亲笔书写的李清照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以及三张底本《佩文斋广群芳谱》的影印照片,并附有序文。书中从原典所载的词中挑选,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作者已出版的花卉词。正文按照39种花卉划分章节,内容包括有关花卉的文献、译词和原词。本书荣获了日本翻译家协会

第27届日本翻译文化奖。

花崎采琰的译注中记载了她与众多文人的交游,这些经历为她的中国词译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灵感。中田勇次郎不仅多次为花崎采琰的译著撰写序言,还给予了花崎采琰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此外,今关天彭的指导、日夏耿之介的推荐也对花崎采琰的译介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这些文人间的交游和互动,花崎采琰的译著不仅得到了认可,还为她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

结语

20世纪后期,民间译者的广泛参与,是这一时期日本词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词在日本的译介形式,也拓宽了其受众群体。通过对花崎采琰及其译介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到她不仅在译介中国词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通过与各类背景的文人交游互动,推动了中国词在日本的传播。花崎采琰的译作,不仅体现了她对中国古典词的深刻理解,也为日本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她与众多文人的交游,也为她的翻译工作注入了更多的学术支持和灵感,使其译作更具深度和影响力。

尽管近年来关于日本“非汉学家”群体的关注有所增加,但对“非汉学家”及其翻译活动的专题研究仍然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群体在中国词的译介及其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贡献,特别是如何通过他们的工作深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理解和认识。此外,也可以考察这些译介活动如何影响了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与理解,为中日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总体而言,花崎采琰的贡献不仅在于她对中国词的译介成果,更在于她所代表的“非汉学家”群体如何通过自身的热情和努力,拓展了中国词在日本的影响力,为日本词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史增添了重要的一笔。她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未来的译介活动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萩原正樹. 20世紀における日本の詞論研究[J]. 言語センター広報 Language studies, 2001, (9): 79-83.
- [2] 刘宏辉. 论近代中日词学交流的新变及其意义[J]. 词学, 2022, (02): 192-204.
- [3] 汪超. 近百年来日译花间词定量分析[J].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7, 22(02): 55-65.